

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

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

戰國文字之陸續出土與發現，豐富了古漢語研究領域之內涵，亦提高了國學研究之水平。而戰國時期之地域文化特色，更造就了南方瑰麗之古楚文化，楚文化之多元與豐富，同樣反映在深具地方特色之楚系文字上。本文即以戰國時期楚國及楚文化圈內附屬國、被滅國之古文字資料為主要研究內容，並以其形聲結構中之多聲符結構為主要研究方向，嘗試探討此類特殊形體結構之內涵與發展，更進而對楚系文字、音系與語言等各方面之相關問題作初步之研究與討論。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戰國楚系形聲結構初探

第三章 加注形音型多聲符構形

第四章 同取型多聲符構形

第五章 結論

所提出來討論之多聲符結構共十五個：湡、鄧、𡗗、霽、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依其造字之發展情況，再分為「加注形音型多聲符構形」與「同取型多聲符構形」等兩類，並從考釋文字之形、音與義等三方面著手，嘗試探索戰國楚系多聲符結構之一些問題。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概述.....	1
第二節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著錄與方向.....	8

第二章 戰國楚系形聲結構初探

第一節 歷史造字層次之形聲結構分析.....	25
第二節 平面組合方式之形聲結構分析.....	50

第三章 加注形音型多聲符構形

第一節 疊加多重聲符例—潛、欽、暨、潛.....	56
第二節 疊加單一聲符例—鄧.....	65
第三節 結論.....	73

第四章 同取型多聲符構形

第一節 雙重標音例

壹、昇.....	75
貳、霽、秀.....	85
參、批.....	120
肆、槩.....	130
伍、戔.....	134
陸、肄.....	139
柒、孳.....	144

第二節 形聲標音例

壹、慈.....	152
貳、梃.....	162
參、繫.....	169
肆、惡(惡).....	179
伍、體.....	187

第三節 結論.....	193
-------------	-----

第五章 結論.....	194
-------------	-----

參考資料.....	197
-----------	-----

圖版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概述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戰國時代由於分國分治的關係，文字形體結構複雜，正體字與俗體字的混用、文字的分化、省減與訛變等，皆說明了本時期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最為混亂的時代。其實，從春秋時代中期以後，古漢字之構形便日趨複雜，尤其正體字與俗體字的相互激盪，以至秦統一文字之前，大抵皆呈現了各地「文字異形」的狀態，即如裘錫圭先生在其所著之《文字學概要》一書中所言：

在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這對漢字形體的演變產生了巨大影響。……舊的貴族階級逐漸為新興剝削階級所取代，文字開始擴散到民間。進入戰國時代以後，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和飛速發展，文字的應用越來越廣，使用文字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文字形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俗體字的迅速發展上。¹

又例如詹鄞鑫先生在其所著之《漢字說略》一書中所言：

春秋中後期開始，不同地區的文字已逐漸形成不同的風格。由於省減和訛變的傳統不同，同一個字在不同地區的寫法也不盡一樣。至戰國時代，文字的分化日趨明顯，當某個地區的俗體成為通行的寫法之後，反過來又影響當地的正體文字。……由此形成許慎在《說文解》中所說的戰國各國「文字異形」的狀態。²

而形聲字之構形，在戰國時期之漢字發展史中，也隨著戰國時代分國分治之影響，產生相當大的變化，造字與用字的比率更甚以往，湯餘惠先生即曾以中山王墓器物銘文為例，說明了戰國時期形聲結構之發展情況：

¹ 詳見裘錫圭先生所著，許師鈺輝校訂之《文字學概要》，台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發行，1994年（民國83年）3月初版，68頁。

² 詳見詹鄞鑫先生所著《漢字說略》，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公司發行，1995年（民國84年）12月初版一刷，100頁。

字形與語音的關係則日益加強，主要標誌便是字形中帶有表音成分的形聲字越來越佔有更大的比重，據我們粗略的統計，中山王墓器物銘文凡 505 字，其中形聲字就有 304 個，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這意味著戰國文字中十之六、七是形聲字。商代的甲骨文我們也做了一些統計，《甲骨文編》正編（附錄不計）見於《說文》的字凡 941 字，其中形聲字只有 216 個，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數字如果多少可以看出一些問題的話，那就是說，由殷商到戰國，形聲字的數量差不多增加了兩倍，帶有表音成分的文字形體大幅度地增加，是戰國文字不同於商周古文的又一個顯著特徵。……總之，表意性削弱而表音情增強，這是戰國文字形體發展中的兩種值得注意的傾向。³

又據李運富先生在其所著之《楚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一書中之研究：

楚簡帛文字單純的義音合成字佔 74%，如果加上形音合成 0.6%、形音義合成 0.6%、音義代合成 0.4%，則共佔 75.6%，要是再加上義音兼功能合成 1.3%和形音兼功能合成 0.7%，那就達到 77.6%。這個比例雖未達到小篆義音合成 85.69%加上形音合成 0.12%的高度，但說楚簡帛文字已經選擇了義音合成的最佳功能模式並以此建構了比較成熟的功能組合系統，應該是成立的。⁴

湯餘惠先生與李運富先生之研究，說明了楚簡帛文字資料形聲字的高比率，不僅遠高於甲骨文與金文中的形聲字比率，也已接近許慎《說文解字》85%以上之水準。⁵但在此大量形聲字產生之際，也產生了一些「以聲符構形為基礎，

³ 詳見湯餘惠先生撰《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6 年，64 頁。

⁴ 詳見李運富先生所著《楚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市：岳麓書社出版發行，1997 年（民國 86 年）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79 頁。

⁵ 在甲骨文方面，依據李孝定先生與近來學者朱歧祥先生之研究，形聲構形之比例已達兩成左右（李孝定先生：統計甲骨文形聲字共 334 字，佔總數之 27.27%，詳見李孝定先生所著《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97 年（民國 86 年）10 月初版第三刷，19 頁；朱歧祥先生：統計甲骨文形聲字 224 個，佔總數之 20.3%，並說明「形聲字佔全數甲文的二成，可見殷人運用聲符造字並非草創。這種據聲造字的方法明顯已展開了一段時期。」詳見朱歧祥先生發表於法國社會科學院東亞語言所在巴黎所主辦的「紀念甲骨文發現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甲骨文表〉一文，1999 年（民國 88 年）12 月 1 日-3 日，而唐蘭先生也曾對此現象提出解釋：「殷商的文字，……而尤其重要的，則是象形象意的文字日就衰歇，而形聲文字興起。這種變動，至遲起於殷初，或許更可推上幾百年。」詳見唐蘭先生所著《古文字學導論 殷虛文字記》，台北市：學海出版社出版，1986 年（民國 75 年）8 月初版，79 頁；在兩周金文方面，祝敏申先生在其所著之《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一書中，曾經就《金文編》第三版與第四版中之金文材料作形聲字之字表與統計，統計出 1367 個形聲字，佔了《金文編》第四版正編 2420 字頭之 56.28%，並說明：「基於青銅器銘文在當時文字考古材料中的重要位置，這個百分比，可以大致反映兩周漢字系統中形聲字的比重，詳見祝敏申先生所著《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98 年（民國 87 年）12 月第一版，1999 年（民

而衍生出來的特殊漢字構形」⁶，此即本文所欲討論的重點：古漢語多聲符字。⁷

古漢語多聲符字，顧名思義，即同時存在兩個以上聲符之構形，即裘錫圭先生所謂的「二聲字」與「兩聲字」，裘錫圭先生在其所著之《文字學概要》一書中曾經提到：

兩聲字，就是由都是音符的兩個偏旁組成的字。……漢字是單音節的。按理說，一個形聲字只要一個聲旁就夠了。形旁一般是用來指示形聲字字義的類別的，也沒有超過一個的必要。但是按照《說文》的分析，有些形聲字卻具有兩個聲旁或兩個以上的形旁我們稱這種情況為多聲、多形。……《說文》明確說成从二聲的形聲字有「竊」與「𩇛」（𩇛）：……總之，真正的二聲字是極少的，而且大概是出於在形聲字上加注音符而形成的。⁸

或何琳儀先生所謂的「形聲標音字」與「雙重標音字」，何琳儀先生在其所著之《戰國文字通論》一書中，曾經提到：

形聲標音，是在形聲字的基礎上又增加一個音符。所增音符與形聲字原有的音符音同或音近。象形標音和會意標音所增音符尚有注音作用，形聲標音另增音符殊為重複戰國形聲標音字甚多，這可能與當時某些書寫

國 88 年）3 月第二次印刷，458 頁 474 頁；因此，從甲骨文、金文與簡帛文字之古文字發展脈絡看來，古漢語形聲字之構形是漸次增加的，尤其到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的小篆系統，形聲字之比率已高達 85% 以上（《說文解字》9353 個字中，許慎明確歸為形聲字的有 8200 個字左右），已成中國文字造字與用字的主流。

⁶ 此處吾人所謂「漢字特殊構形」一詞，其「特殊性」，乃基於這些構形之字，並未能盡合於六書構形理論系統而言。蓋六書之構形體例，基本上是針對小篆之構形系統而言，雖亦可適用於先秦古文字，但卻未必能盡合也。關於這方面的論點，近來已有一些學者提出，例如：江學謙先生曾發表過對許慎六書體制之質疑，曰：「許慎對『形聲』的界說……所據以尋繹其理的則是後世的小篆，自不足以明其本始。」詳見《東海學報》28 卷，1987 年（民國 76 年）6 月，江學謙先生所撰〈六書形聲研究〉一文，第 5 頁；而王寧先生在李國英先生所著之《小篆形聲字研究》序言中，亦指出：「『六書』是基本上符合小篆也只能符合小篆的，它僅是對小篆的構形加以總結，而非各種形制的歷代漢字構形分析的廣泛原則。」詳見李國英先生所著《小篆形聲字研究》王寧先生所撰之序言，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96 年（民國 85 年）6 月第一次印刷；另外，宋建華先生在今年 12 月 18 日靜宜大學中文系所主辦之「紀念甲骨文發現百週年文字學研討會」上所發表之〈象形指事界說考辨——以許慎六書說為範疇〉一文中，亦曾補證朱星、唐鄧鑫與王寧先生等諸位學者之說法，認為「朱星、唐鄧鑫、王寧諸家皆能留意六書說的構成，其侷限性在於以『篆文』作為分析的材料，採『平面』式的歸納方法。因此，從適用對象上，不能適用於所有字形的分析。從歸納的方式上，只說明文字的共時性，不能說明文字的歷時性。」詳見該文抽印本第 8 頁。

⁷ 古漢語多聲符字，廣州中山大學陳偉武先生又稱其為「雙聲符字」，並將此一構形之漢字研究歸入其所負責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特殊漢字的歷史考察」階段性成果之一，並曾在紀念徐中舒先生誕辰一百週年暨國際漢語古文字學研討會上發表〈雙聲符字綜論〉一文，此文並見載於《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 年（民國 88 年）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328 頁-339 頁。

⁸ 詳見裘錫圭先生所著，許師錢謙校訂之《文字學概要》一書，177 頁-178 頁。

者崇尚繁縟的心理有關。……雙重標音，指組成一個字的兩個偏旁都是音符。形聲標音與雙重標音都有兩個音符，但前者三部件中有形符，而後者兩部件中無形符。所以昔人又名「雙重標音」為「皆聲」。「皆聲」中的兩個音符可能有一個音符兼有形符的功能，另一個音符則純粹起表音作用。這類字偏旁之間的關係含混，或字義待考，或字義抽象，據定形符，暫有困難，故單列一類。⁹

實則東漢許慎即已注意到這個特殊構形，而將此構形名為「皆聲」，並舉了「竊」與「𡗗」兩個例子：

竊 盜自中出曰竊，从穴未，𡗗皆聲也，𡗗古文疾，𡗗𡗗字也。¹⁰ 𡗗 𡗗也，从隹次弟皆聲。𡗗 𡗗或从齊。¹¹

雖然許慎與何琳儀先生對所謂「皆聲」的界定仍或有不同，¹²但皆指此類字具有多重表音部件之看法是頗為一致的，而其形構之特殊，明顯違反了漢字形聲字構形「一形一聲」之原則，歷來已有一些學者對此構形抱持著質疑與否認的態度，例如：唐蘭先生在其所著之《中國文字學》一書中，就曾指出：

關於三體或四體的諧聲，後人分析作二形一聲，三形一聲和二聲，共有三類，這時在是錯誤的。我認為形聲字在造字時，只有一形一聲，（當然有些聲母本身已是形聲字，）絕對沒有同時用兩個形或兩個聲的。¹³

又高明先生在所著之《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一書中，亦曾指出：

過去所謂二形一聲、三形一聲等等細目，皆不符合形聲字的實際狀況，是對形聲字結構的誤解。形聲字是複體字，都是一聲一形，所謂複形複聲是不存在的。¹⁴

⁹ 詳見何琳儀先生所著《戰國文字通論》，北京市：中華書局出版，1989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202頁-203頁。

¹⁰ 詳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台北市：書銘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94年（民國83年）10月七版，336頁-337頁。

¹¹ 詳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一書，340頁。

¹²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所舉的「皆聲」之例，乃「一形二聲」（𡗗）與「二形二聲」（竊）之例，這種構形方式之認同顯然與何琳儀先生之「皆聲」為雙重標音構形說法有所不同。依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廣義說法言之，兩者「皆聲」之說法皆可成立，但若依古漢語多聲符字狹義之構形理論言之，則何琳儀先生的「皆聲」說法，似乎已造成其所謂「形聲標音字」與「雙重標音字」兩種構形的混淆，實有再商榷的必要。

¹³ 詳見唐蘭先生所著《中國文字學》，台北市：台灣開明書店發行，1993年（民國82年）11月臺九版發行，107頁。

¹⁴ 詳見高明先生所著《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1993年（民國82年）12月初版一刷，77頁。

按唐蘭先生與高明先生之看法亦是正確的，亦即漢字之單音節性質，證明了多聲符字在造字或音讀時，只有一個聲符之可能性，而古漢字形聲結構之歷時性造字層次，則證明了多聲符字非多形多聲結構之可能性。雖即如此，但在戰國時代複雜之政治與社會背景影響下，形聲結構之造字與用字亦隨之日漸複雜，形符與聲符之組成結構不甚穩定，往往有不同於一般演變規律之情況發生，且其部件之性質與功能亦複雜，或仍有諸多疑點尚待釐清。尤其古漢語多聲符字之造字與用字理論牽涉範圍甚廣且複雜，可反映出古漢字與語言、社會、文化等多方面之關係。因此，本文將針對這種古漢字中的特殊構形，以具濃厚地方色彩與語言特色之楚系文化圈之古文字作為主要之研究材料，¹⁵並徵之以甲骨文與金文等古文字資料，作一全面性的研究與考察，期能建立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理論體系。

貳、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本文之研究範圍將限定在戰國時代楚系古文字資料中之多聲符字構形。有幾點需提出來作說明：

（一）戰國時代起迄年代之界定：在有編年資料之出土文獻與古籍資料中，曾經對戰國時代之史事與史料做過系統性整理的，主要以漢司馬遷著《史記·六國年表》、¹⁶《古本竹書紀年》、¹⁷湖北雲夢睡虎地秦

¹⁵ 大批楚系銅器、簡牘與帛書等古文字資料的陸續出土，印證了戰國時代楚系文字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從戰國早期承繼春秋中晚期楚系銘文「字體頹長、筆畫詭曲」之特點，發展到戰國中、晚期簡牘帛書「扁平欹斜、簡易草率」手寫體文字成為主導地位，並影響銅器文字的風格，何琳儀先生在其所著之《戰國文字通論》一書中，就曾提到：「楚國是戰國時期最大的國家，由於歷史和地域的原因，自春秋以來就形成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文化。……總體來看，楚文字雖然只是戰國文字的一個分支，但它濃厚的地域特點，在研究戰國文字時應特加重視。」詳見何琳儀先生著《戰國文字通論》一書，152頁，而黃錫全先生在其所撰之《楚系文字略論》一文中，對於楚系文字地域性特點之產生背景，也作了說明：「造成這種區域性差別（指楚系文字之區域性特點）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環境、語言及書寫習慣等因素形成的。周王室衰弱，天下失去統一，長期的列國分裂局面大大地削弱了各國之間的正常交往。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又需要文字這個記錄語言符號的工具能夠與其相適應，甚至需要創造新字以應急需；應用文字的對象和範圍不斷擴大，書寫形式和材料不一，書寫者的文化素養又不盡相同；文字又不斷按其「簡便易行」的規律發展。因此，出現一些差異是不奇怪的。既便一系文字之內，國與國之間，異國之地區之間，書寫者之間也有差別。這些差異，隨著材料的不斷增加，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詳見黃錫全先生所撰《楚系文字略論》一文，發表於《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103頁；至於上古楚語，則以《老子》、《莊子》與《離騷》等古籍文獻資料為代表，再加上《說文解字》、《方言》中之記載及近來陸續出土之楚系古文字資料，明顯與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雅言區隔，而與上古齊語享有同樣的聲望。因此，楚系文字之豐富出土文物，社會文化背景、濃厚地方色彩與語言特色，是我們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的最佳材料。

¹⁶ 詳見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台北市：宏業書局出版，1995年（民國84年）4月15日再版，185頁-203頁。

¹⁷ 戰國初期魏國史官所作編年體之《竹書紀年》，早在宋代已散失，此處之《古本竹書紀年》，乃指清代朱右曾所著之《汲冢紀年存真》、民國王國維先生所著之《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與《古本竹書紀年疏證》、范祥雍先生對王國維先生「輯校」之訂補、方詩銘先生與王修齡先生所著之

簡《編年記》、¹⁸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¹⁹南宋呂祖謙所著《大事記》、²⁰清代林春溥所著《戰國紀年》、²¹清代黃式三《周季編略》²²等著作爲代表，但戰國時代起迄年代之界定，除了結束年代公認爲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公元前221年之外，開始年代之界定則有不同的說法，依據楊寬先生所著《戰國史》之整理，大體上有四種異說，²³但基於文字之演變並非有絕對時間斷限之原則，本文之研究時間範圍，除了將以戰國時代之時間爲研究主軸外，並將擴及於春秋中晚期與秦漢時期之相關楚系器物群。

(二) 戰國時代楚系古文字資料之範圍：最早將戰國時代文字作分域研究者，首推胡小石先生在其所著之《齊楚古金表》一書中，對其所謂「齊楚兩派」文字風格與特點之說明；而到了李學勤先生撰《戰國題銘概述》一文時，更依據戰國時代之金文資料，將戰國文字明確分爲齊國、燕國、三晉、兩周、楚國與秦國等六個地域來作研究與分析，²⁴奠定了戰國文字分國分域研究之基礎，其後之有關戰國文字分國分域之研究著述，例如：許師學仁所著之《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²⁵或何琳儀先生所著之《戰國文字通論》²⁶，大抵皆承襲李學勤先生之理論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等一系列從古書中輯出《竹書紀年》佚文之專著資料，以有別於現存之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資料可參考楊寬先生所著之《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8年（民87年）3月第3版第10次印刷，21頁-22頁。

¹⁸ 詳見睡虎地竹簡整理小組所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78年（民6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頁-13頁。

¹⁹ 詳見宋司馬光所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市：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民國45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頁-185頁。

²⁰ 詳見南宋呂祖謙所著《大事記》，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民國86年），161頁-178頁。

²¹ 詳見清代林春溥所著《戰國紀年》，收錄於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叢書中，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書局刻居還書本影印，1997年（民國86年）。

²² 詳見清代黃式三所著《周季編略》，同樣收錄於註21所引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叢書中。

²³ 楊寬先生在其所著之《戰國史》一書中，對於戰國時代起迄年代之界定，提出了他的看法：「戰國時代的結束年代，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公元前二二一年，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它的開始年代，大體上有四種說法：一、起於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四八一年。宋代呂祖謙的《大事記》就是從這年開始的，……二、起於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四七五年。漢代司馬遷《史記》的《六國年表》就是從這年開始的，……三、起於周貞王元年，及公元前四六八年。清代林春溥《戰國紀年》和黃式三《周季編略》都是從這年開始的。詳見楊寬先生所著《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民國69年）7月第2版第7次印刷，3頁-4頁。

²⁴ 詳見李學勤先生所撰《戰國題銘概述（上）》、《戰國題銘概述（中）》與《戰國題銘概述（三）》等三篇專文，分別見載於《文物》1959年第7期，50頁-54頁；《文物》1959年第8期，60頁-63頁；《文物》1959年第9期，58頁-61頁。

²⁵ 許師學仁在其所著《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之博士論文之中，將戰國文字分成東周、秦國、齊國、楚國、晉國（魏、趙、魏、中山）與燕國等六個分域，詳見許師學仁所著之《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年（民國75年）10月。

²⁶ 何琳儀先生在其所著之《戰國文字通論》一書中，將戰國文字分成齊系文字、燕系文字、晉系文字、楚系文字與秦系文字等五種分域，詳見何琳儀先生著《戰國文字通論》一書。

基礎而發揮。至於「楚系文字」一詞，最早即由何琳儀先生在其所著之《戰國文字通論》一書中所提出，何琳儀先生「系」的觀念乃以「地區」爲分類之基準，一系之內可包含若干國家之文字，²⁷而對於楚系文字之內涵，何琳儀先生則明確指出爲：

自春秋中葉以來，以楚國爲中心的文化圈，除包括吳、越、徐、蔡、宋這些較大的國家之外，還包括漢、淮二水之間星羅棋佈的小國。²⁸

已爲楚系文字之時間與空間概念奠定基礎；而在黃錫全先生所撰之《楚系文字略論》一篇專文中，更詳細說明了楚系文字之研究範圍：

一、楚國的文字。……二、楚所滅之國，在其被滅以後所書寫、鑄刻的文字。……三、受楚文化影響較深的它國文字。……就時間而論，其特徵主要表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因此，研究楚系文字的重點也就在這一階段。就空間而論，楚系文字分佈較廣，大致包括今之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江蘇以及浙江、廣西等省。²⁹

因此，本文之主要研究對象：戰國時代之楚系文字資料之研究範圍，基本上以何琳儀先生與黃錫全先生之概念爲基礎；在時間上，就如上所言除了以戰國時代爲主軸外，並擴及於春秋中晚期與秦漢時期之相關器物群；在空間上，則依照器物出土之地點與製作背景，推測其與楚國之關係，若符合黃錫全先生所說之原則，則納入本文之研究範圍。

二、研究方法：戰國時代楚系多聲符字之構形研究、聲韻分析與文化探討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幾個重點，研究方法與步驟如后：

(一)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界定：此部分之研究，包含幾個研究重點：

1. 聲符之界定、功能與性質。
2.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界定。
3. 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傳統六書理論之關係。

此部分之研究著重觀念之釐清與體例之制訂，以作爲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理論基礎。

(二) 戰國時代楚系多聲符字之構形分析：此部分之研究，包含幾個研究重點：

1. 諧聲系統與通假系統之初步整理。

²⁷ 詳見何琳儀先生著《戰國文字通論》一書，78頁。

²⁸ 詳見何琳儀先生著《戰國文字通論》一書，135頁。

²⁹ 詳見黃錫全先生所撰之《楚系文字略論》一文，發表於《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100頁-101頁。

2. 形符或聲符之性質及其組合之原理。

3. 形符或聲符之布局狀態及其構形演變過程。

(三) 戰國時代楚系多聲符字之聲韻分析：此部分之研究，包含幾個研究重點：

1. 戰國古音系與古楚音系之初步整理。

2. 聲符與本字之聲韻關係。

3. 所保留戰國古音系或古楚音系之聲韻現象。

(四) 戰國時代楚系多聲符字之文化分析：此部分之研究，包含幾個研究重點：

1. 歷史文化背景。

2. 地域色彩。

(五) 戰國時代楚系多聲符字在漢字發展史中的地位：此部分之研究，包含幾個研究重點：

1. 起因之研究。

2. 使用頻度。

3. 後世之使用與發展狀況。

第二節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著錄與研究方向

嚴格說來，歷來之文字學者，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並不多，甚至於仍未有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專書問世，但隨著古文字資料的陸續出土與發表，這種古漢字的特殊構形，也開始引起古文字學者們的注意。在本章節中，將介紹歷來前輩學者們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成果，並嘗試作評述與檢討。

壹、研究著錄

在東漢許慎之《說文解字》中，明確指出「皆聲字」者，僅「竊」³⁰與「鑿」³¹兩個例子。而歷來之文字學者之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論著，大多仍以許慎所舉之此二字為主，並未旁及於更多的研究材料，而且大多將此種特殊之構形歸入形聲字構形分類中之一類看待，未有更詳細或更深入之探究。

但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迅速發展，有愈來愈多的古文字資料證據顯示，確有古漢語多聲符字構形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前輩學者們的關注，甚至引用這些古文字資料修正許慎《說文解字》之說法，研究之成果也較豐富，茲列舉較具代表性之相關研究論著，依發表年代排序，並略作評述如后：

³⁰ 詳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一書，336頁-337頁。

³¹ 詳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一書，340頁。

一、蔡信發先生所撰〈說文形聲字之多聲考〉：³²蔡信發先生的這篇專文，突破了傳統《說文解字》對古漢語多聲符字僅限於「竊」與「鑿」二字的狹隘看法，揭示了許多「誤形聲字之多聲為會意者與誤為多形一聲者」之古漢語多聲符字，共45例，但蔡信發先生對這些例字之考證，大多是著重在聲韻關係之考證上，並未對文字構件之音義關係與造字層次作更深入之界定，而且也未對這些構形之起因與發展作綜合性的整理，實屬可惜，但蔡信發先生突破傳統《說文解字》窠臼的論點，卻是值得肯定的。

二、袁家麟先生所撰〈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³³袁家麟先生這篇專文，以金文中之「純雙聲符字」構形為主要之研究材料，材料之範圍雖稍嫌小了些，但仍有一些理論觀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 純雙聲符字之範圍與分類：大體而言，袁家麟先生將純雙聲符字分為兩類：

1. 一類是人名或地名之專用字，袁家麟先生以為此類字之起因，乃導因於「避免混亂與麻煩」，亦即所謂「避免混淆」，其於造字之初，為了表人名或表地名借用一個同音字替代，而人們「又恐誤為它義，遂以兩個同音（或音近）字合為一字」，遂形成一個純雙聲符字，但此類構形之起因是否即為「避免混亂與麻煩」，恐需再作更進一步之查證，此若再考量語言學語音變遷與方音差異等因素，則疑此類字之產生，不無有造字者受限於語言之時間與空間因素，而再附加一個表音聲符之可能性，況袁家麟先生在文中亦提出方言與語音等影響動因，故除了「避免混亂與麻煩」有可能為純雙聲符字之起因外，其他語言或方言上的一些現象，可能亦為影響純雙聲符字產生之關鍵因素。另外，袁家麟先生亦言及此類「純雙聲符」構形之六書歸類：

此類字比較特殊，在六書中尚無適當位子，當屬六書外的另一類構字法。若必勉置於六書，則假借或差可耳。³⁴

按若依袁家麟先生之釋形分析，則此類多聲符字之組成部件，實際上皆為具表音性質、且不兼義之部件，因其部件皆不兼義，故難以將此類形構置於傳統六書之形聲類別之中，反而即如袁家麟先生所論，置於假借一類為適，然此類形構之組成方式特殊，雖勉置於假借一類，皆仍有再商之空間。

³² 詳見蔡信發先生所撰〈說文形聲字之多聲考〉，發表於《中國學術年刊》1982年（民國71年），33頁-48頁。

³³ 詳見袁家麟先生所撰〈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發表於《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85頁-89頁。

³⁴ 詳見袁家麟先生撰〈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89頁。

2.另一類則是本為常用字，再附加一個聲符所組合而成的純雙聲符字，這類字之起因亦不容易界定，袁家麟先生以為此類形構之起因為「書法上的美觀因素」，又以為：

這只能說明，書銘者或是有意識地製造純雙聲符字，或是無意識地書寫以異體字形式存在於社會上的純雙聲符字。³⁵

其說法不免失之模糊，但較可確定的是，此類構形在附加聲符後，其別嫌與分化作用不顯，與王筠《說文釋例》一書中所說的「分別文」之傳統形聲字構字方法不同，³⁶且於此類純雙聲符字構形中，亦有附加音義皆近同構件之情況，更是明顯與袁家麟先生所說之另一類組成部件皆不兼義之多聲符形構不同，因此，這類純雙聲符字之構形原理究竟為何，若能對此問題作更深入之探討，相信對純雙聲符字構形之釐清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 (二) 純雙聲符字與六書之關係：袁家麟先生將純雙聲符字分為兩類，但對此二類是否列入六書之範圍，則有不同的看法：屬於人名或地名專用字之純雙聲符字構形，因為兩個表音與借音構件都不兼義，所以袁家麟先生認為無法將之歸入六書之中，但「若勉置於六書，則假借或差可爾」；至於本為常用字，再附加一個聲符所組合而成的純雙聲符字構形，因其兩個表音構件至少有一個具有兼義之功能，所以袁家麟先生認為可將其視為「形聲字中的特殊類」。其實，以漢字之發展歷程而言，六書之構形理論基礎主要是著眼於小篆系統，對於先秦古文字，雖亦可適用，但未必盡合，我們大可將這些漢字之特殊構形拿來與六書構形理論作比較，若欲強歸其類屬，恐怕會造成更多構形解釋上的誤解與附會，因此，純雙聲符字究竟應屬於六書中之哪一類，應不是研究之重點，而這些特殊漢字構形與六書彼此間的關係，才應是我們需詳加深入作討論的重點。

- (三) 純雙聲符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不可諱言，純雙聲符字之發展，在歷經秦代之文字統一歷程之後，已逐漸淡出漢字構形系統，人們使用「兩個聲符」造字與構字之頻率已大幅降低，對於這種現象，袁家麟先生認為主要是因為：

這與漢字總的表意性質不合，也不符合漢民族認字、識字的傳統心理習慣，並且也不符合文字在歷史發展中要求逐漸簡化和標準化的總趨勢，所以這種構字方法不但沒有發展前途，而且終於不可避免地被社會逐

³⁵ 詳見袁家麟先生撰《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88頁。

³⁶ 詳見清代王筠所著《說文釋例》一書，同樣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叢書中，1995年（民國84年），18頁-30頁。

漸淘汰。

蓋漢字的發展不外繁化與簡化二途，純雙聲符字構形之發展也許只是先秦漢字發展歷程中的一種繁化現象，這種構形之興衰起落，除了受到如袁家麟先生所謂「簡化」與「標準化」等文字發展本身限制因素之影響外，外在之語言環境、歷史背景、政治發展與教育文化等因素，也都可能影響到純雙聲符字之發展，否則，這種特殊之漢字構形也不會只是存在於先秦之古漢字構形系統而已。

- 三、張建葆先生所撰〈說文中的加形加聲字〉：³⁷張建葆先生以《說文解字》中之本篆與重文為主要之研究材料，歸納出其所認為「跟真正的形聲字是非常不同的，……可去掉聲符，而不影響他們原來的音義」的「加形加聲字」167例。蓋張建葆先生所謂之「加形加聲字」中之「加聲字」，即上述袁家麟先生所謂之「純雙聲符字」構形中「本為常用字，再附加一個聲符所組合而成的純雙聲符字」之一類，其構形之界定亦為「可去掉聲符，而不影響他們原來的音義。……加聲之字，其聲符大多是無義可說的」，只不過張建葆先生以「加聲字」之名來稱呼這類構形之字，恐怕還需再斟酌，因為以文字或形聲字之發展歷程而言，不管是加形字或加聲字，其所附加之形符或聲符具有辨義作用者，仍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即如王筠《說文釋例》中所謂之「分別文」或「累增字」等，³⁸而其中真正加聲後音義不變者，才可算是張建葆先生所謂之「加聲字」，因此，張建葆先生以「加聲字」之名來稱呼實際上為「純雙聲符字」構形之字，其範圍似乎仍稍嫌大了些；另外，雖然張建葆先生已對加聲字之起因作了條理性的整理，提出「為避形混」、「為避義混」、「方國異音或古今音變」與「明其音讀」等理由，但張建葆先生也指出：

重複在形者易知，在聲者難見。……加聲符的原因，究竟是為了避免義混，聲音轉變，還是僅僅明其音讀，也不容易分得清楚。

可見張建葆先生也不否認「加聲字」構形之構形複雜度與研究困難度，這些都是未來我們可以再努力研究的方向；還有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張建葆先生在文中明確指出「加聲字」與孳乳、轉注等文字演變現象之密切關係，而張建葆先生雖然認為「加聲字」與形聲字是「非常不同的」，但也不否認「加聲字」與形聲字的形成，應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有此可知，張建葆先生對於「加聲字」之構形，雖未明確

³⁷ 詳見張建葆先生所撰〈說文中的加形加聲字〉一文，曾經發表於民國81年12月19日與20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與中國文字學會所舉辦之「魯實先生學術討論會」，全文可見當年主辦單位所編之《魯實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³⁸ 詳見清代王筠著《說文釋例》一書，同樣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叢書中，1995年（民國84年），18頁-30頁。

指出其與六書構形理論之關係，但他所提出「加聲字」與孳乳、轉注與形聲等漢字構形演變現象之關係，若再加上上述袁家驥先生提到「純雙聲符字」與假借之關係，這些都可提供我們未來研究方向之參考。

四、湯可敬先生所撰《〈說文〉“多形多聲”說研究》與《〈說文〉“多形多聲”說研究（續完）》：³⁹湯可敬先生稱古漢語多聲符字為「多層形聲字」，並將其界定為：

所謂“多形多聲”，是指一個形聲字有在同一平面上的兩個以上形符，或兩個以上聲符。前者叫做多形字，後者叫作多聲字。

湯可敬先生根據許慎《說文解字》釋形之說法，在大徐本中歸納「多形多聲字」共 82 個，其中所謂的「多聲字」有四個，所謂的「多形又多聲」字只有一字。湯可敬先生這種歸納與歸類方式，雖然承襲了舊有許慎對「竊」與「𡵓」二字為「多聲」構形之說法，而且還提出「多形多聲」兼具結構之字例，但湯可敬先生對這種「兩個聲符以上」之構形，主要還是持否定的觀點：

我們把《說文》所收的 82 個多形多聲字一一考察之後，結論是：《說文》的“多形多聲”說，往往是把多層形聲字誤解為多形字或多聲字，把一般形聲字誤解為多形字，把會意字誤解為多形字，把象形字誤解為多形字。

湯可敬先生的說法，大抵和前所述唐蘭先生《中國文字學》⁴⁰與高明先生的《中國古文字學通論》⁴¹等各文字學者專著中的說法類似。其實湯可敬先生所謂「多層形聲字」，僅包含古漢語多聲符字構形「形聲標音」字之一小部分而已，受限於研究材料只及於《說文解字》，其他像所謂的「純雙聲符字」（即「聲符+聲符」）構形，湯可敬先生在文中並未提及，如果湯可敬先生有注意到這種特殊構形之字的話，相信會改變他對古漢語多聲符字的看法；而且古漢語多聲符字之造字與構字，其所涉及之語言聲韻資料至為複雜，甚至涉及方言學之內容，湯可敬先生在這方面所引用之資料似乎僅侷限於中原音系，恐怕有證據不足之虞。

五、龐海珊先生所著《〈說文〉多形多聲字考辨》：⁴²這是台灣第一篇研究「多形多聲字」之碩士專業論文，但對多聲符字舉例不多，除列舉三個「形聲標音字」構形外，並未再舉「純雙聲符字」之例，且龐海珊先生對「多

形多聲字」構形，持否定之態度，認為「多形多聲字」之產生，乃是因為文字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衍化」、「誤合」與「訛變」等各種現象之影響，蓋龐海珊先生之論點與上述之湯可敬先生之說法相近，而所用之研究材料除了以《說文解字》為主要研究內容外，雖亦旁及於甲骨文或金文，但對構形相對複雜之戰國文字資料卻引用尚少，恐怕有漏失許多重要證據之虞；而對古多聲符字影響至廣之語言聲韻之證據資料，在文中亦引用不多，尤其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最應注意文字構字與特定時間空間語言聲韻現象之配合研究，如此一來，始可對古漢語多聲符字有所界定與詮釋，如果只是純粹從構形演變方面著手，證據恐怕仍稍嫌不足。不過，龐海珊先生所提出「衍化」、「誤合」、「訛變」等影響「多形多聲字」產生之因素，尤其「義符與聲符相互轉化」與「異時異地造字，後來的人為求字形的一致，故將兩字合為一字」等觀念，值得作為我們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起因時之重要參考。

六、吳振武先生所撰《古文字中的形聲字類別》（原題為：〈古文字中形聲字類別的研究——論「注音形聲字」〉）：⁴³依吳振武先生之論證，此處所謂「注音形聲字」，包含了「表意字加注音符」與「形聲結構加注音符」兩類，第一類當即如龍宇純先生所說之「意音文字」，或可歸於一般形聲字之範疇，而第二類亦即裘錫圭先生與何琳儀先生所謂「兩聲字」或「形聲標音」之構形，其形構之組成，乃在原已具聲符部件之結構上再附加聲符，其繁腫之標音方式，或可視為形聲結構之一項特殊類，大抵而言，吳振武先生已開始注意到古漢字構字系統「加注音符」之組成方式中，而其中「形聲結構加注音符」之方式，或可能為多聲符字產生之主要原因之一。

七、陳偉武先生所撰《雙聲符字綜論》：⁴⁴陳偉武先生此篇專著，可謂近年來對古漢語多聲符字研究集大成之代表作，同時也是陳偉武先生所負責大陸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特殊漢字的歷史考察」的階段性成果。文中明確指出雙聲符字之構形分類，有「形聲標音字」與「純雙聲符字」兩種，所涉及之研究材料亦廣及於各種先秦古文字，相當有助於古漢語多聲符字構形之釐清，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

（一）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範圍與構形特色：陳偉武先生依照文字構件之音義分析，將古漢語多聲符字分成兩類，即「形聲標音字」與「純雙聲符字」，而「形聲標音字」又包括了一部分「兩個構件音義均相同相近的字」，陳偉武先生指出：

³⁹ 詳見湯可敬先生所撰《〈說文〉“多形多聲”說研究》與《〈說文〉“多形多聲”說研究（續完）》，皆見載於《語言文字學》1992年2月，117頁-129頁。

⁴⁰ 詳見唐蘭先生著《中國文字學》一書，107頁-108頁。

⁴¹ 詳見高明先生著《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一書，75頁-77頁。

⁴² 詳見龐海珊先生所著《〈說文〉多形多聲字考辨》，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民國85年）6月。

⁴³ 詳見吳振武先生撰《古文字中的形聲字類別》，作者惠賜待刊稿。

⁴⁴ 詳見陳偉武先生撰《雙聲符字綜論》，發表於《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328頁-339頁。

筆者採用了袁氏「純雙聲符字」的提法，⁴⁵同時認為這一類屬於狹義的概念，而廣義的雙聲符字則包括了所謂「二聲字」或「形聲標音」字，也包括一部分兩個構件音義均相近的字。……純雙聲符字的兩個構件均表聲，不表義。……有一類雙聲符字，是在形聲字基礎上加上聲符而形成的，其所从的義符較易判斷。……有些字也由音同音近的兩個偏旁組成，但兩個偏旁都兼有意義，廣義上它們也算多聲符字。

很顯然地，陳偉武先生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分類標準，乃漢字構件之表義情況，但「形聲標音字」一類中的「兩個構件音義均相同相近的字」，依文字之構件架構，依據上述所引袁家麟先生〈漢字純雙聲符字〉一文中對純雙聲符字分類的說法，實可將其放入「純雙聲符字」一類中討論即可，因為這類字並無純表義之形符或義符，與「形聲標音字」之構件架構存有相當明顯之差異，反而與「純雙聲符字」「只有兩個聲符構件」之構件架構較為接近。但整體而言，陳偉武先生已經為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範圍與構形特色作了相當詳實之界定與分析，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另外，陳偉武先生在考釋「純雙聲符字」「響」字時，指出「雙聲符字亦有省聲之例」，這種特殊之構形情況，亦值得注意。

(二)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陳偉武先生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雖未作通盤性的研究與檢討，但在探討「形聲標音字」一類之構形時，曾引述何琳儀先生〈戰國文字通論〉「崇尚繁縟」的說法，並指出「形聲標音字增多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原有形聲字的聲符表音不明確」。這兩種說法，的確都是古漢語多聲符字產生之主要原因，但我們所要提出的疑問是：何琳儀先生與陳偉武先生針對「形聲標音字」所提出的這兩項產生原因，是否能夠適用於全部的古漢語多聲符字，就如同前述張建葆先生〈說文中的加形加聲字〉「避免混淆」之理由，是否也可算是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產生原因之一，這都將是值得再深入探究的問題，更何況「純雙聲符字」之構形架構與「形聲標音字」仍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其構形所牽涉到的造字與用字歷程都有再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三)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爭議焦點：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形聲字之關係為何？這個問題一直是歷來學者爭議的焦點。而陳偉武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探討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形聲字的關係。蓋陳偉武先生不僅承認「純雙聲符字」的存在性，並且認為「增加義符之純雙聲符字」與「增益聲符之廣義的雙聲符字」與形聲字間存在某些聯繫，是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形聲字。但陳偉武先生的這種說法，仍讓人覺得

有些模糊，其所持的理由：文字構件的表聲本質，是否就足以作為界定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條件，恐怕還需要更縝密的分析才行，尤其文字構件表音功能之確定，仍須考量到聲韻語言方面的時間與空間分析，才能判定此文字構件在其特定之時間與空間環境中（例如特定時間與空間環境之諧聲系統或通假系統等），是否仍具表聲功能之本質，因此，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界定仍須從嚴認定，否則，將會造成與形聲字認定上的混淆；至於陳偉武先生在說明中所強調的「某些聯繫」與「某種特殊性」，這些「某些」與「某種」究竟是指什麼？陳偉武先生並未明指，這也都需要作更詳細之界定。

(四) 修正許慎《說文解字》說解之誤：由於有豐富的古文字引證資料，陳偉武先生得以據此修正許慎《說文解字》說解之誤。但在陳偉武先生所舉證之例字中，絕大多數是修正許慎誤以聲符為形符之例，且將「𠂔」、「𠂔」、「𠂔」等例字皆界定為「純雙聲符字」構形，至於對許慎《說文解字》一書中是否有「形聲標音字」之構形，陳偉武先生則未提及，也未舉例；不過，陳偉武先生在解說「純雙聲符字」時，曾舉「𠂔」字為例，並引述王國維先生的說法，認為「𠂔」字是「次弟皆聲」之「純雙聲符字」，進而認定「𠂔」字是从非歛聲之一形一聲字，陳偉武先生的說法，雖與唐蘭先生在其所著之《中國文字學》一書中「對「𠂔」字之看法近同，但對「𠂔」字之解釋，卻有可能幫助我們更瞭解「純雙聲符字」構形再附加形符之歷史演變過程，惜陳偉武先生並未對「𠂔」字作更進一步之考釋，否則將有可能解釋更多的「純雙聲符字」構形之歷史演變情況，甚至解開古漢語多聲符字至秦代以後陸續減少之謎。

(五)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未來研究方向：除了上述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形聲字之間的關係需要作更深入之界定以外，陳偉武先生在文章當中，也強調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文字構件語音關係之重要性，不僅可探索古代之聲母與韻母，更可作為研究特殊聲韻現象（例如：複輔音）之重要佐證資料，印證了竺師家寧所提出由形聲與假借研究複聲母理論之可行性；⁴⁶其實，吾人以爲，古漢語多聲符字構件中所呈現出來的聲韻語音現象是相當豐富且複雜的，所涉及到的範圍廣及於語言學與方言學之領域，若能以縝密的聲韻方法加以研究與探討，相信能夠有助於對古漢語多聲符字構件語音現象之釐清，甚至可為古漢字與語言之關

⁴⁵ 唐蘭先生在其所著之《中國文字學》一書中，明確指出許慎釋「从」字為多聲字之誤，並引用石鼓文中之「𠂔」字，證「𠂔」字為「從非歛聲」之一形一聲字。詳見唐蘭先生著《中國文字學》，108頁。

⁴⁶ 竺家寧師曾經於民國81年12月19日與20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與中國文字學會所舉辦之「魯實先生學術討論會」中，發表〈由形聲、假借考複聲母的可行性〉一文，闡述由形聲與假借資料中研究複聲母之可行性與方法，全文可見當年主辦單位所編之《魯實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⁴⁵ 陳偉武先生在這裡所說的「袁氏」乃指註33所引，撰〈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一文的袁家麟先生，詳見陳偉武先生撰〈雙聲符字綜論〉一文，329頁。

係作更進一步之詮釋與解答。

至於其他關於文字學或文字構形的通論性著作，對於古漢語多聲符字亦有詳細界定或闡釋者，茲依發表之年代先後，略作評述如后：

- 一、鄭樵《六書略》：在鄭樵六書形聲分類中，除了分為「正生」與「變生」兩大類外，在「變生」一類中，又有「子母同聲」之一小類。依鄭樵之釋字，似指形符與聲符同音者，即可稱為「子母同聲」，雖鄭樵釋字之意旨可能並非純是爲了提出多聲符字之觀點，然鄭樵所舉之字例，例如：「𠂔」或「𠂔」等，皆爲後世文字學家論證多聲符字之論證之一，因此，鄭樵「子母同聲」之說，對後來多聲符字之研究，實有相當程度之啓發作用。
- 二、清代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序》：「蓋段玉裁在注文中明確指出形聲中亦有「一字二聲」之例，但段玉裁之說法主承許慎之說，仍須再斟酌。
- 三、王國維先生所撰《觀堂書札（與羅振玉先生論學手札）》丙辰年（1916年）第二札、第七札：「王國維先生雖然對許慎之說法與例字有所修正，但他仍然是承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存在性，並考證「𠂔」、「𠂔」、「𠂔」、「𠂔」等字其實都是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構形。
- 四、林義光先生所著《文源》：「林義光先生在書中卷十二揭示「二重形聲」之形構，並舉了二十四個例字，林義光先生雖未對此類字例之性質作界定，但從其各字例之解說中，大抵可看出其所謂「二重形聲」之形構，乃指組成文字之兩個部件皆不兼義，同時亦具表音功能，實即本文前所述之「純雙符形構」，林義光先生此項說法之提出時間甚早，對後來多聲符形構之研究有相當程度之啓迪作用。
- 五、馬宗霍先生所著《文字學發凡》：「馬宗霍先生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雖仍未跳脫《說文解字》「竊」與「𠂔」二字研究的窠臼，但對於「二聲字」的起因，馬宗霍先生認為乃「以兩字聲況一字之音，殆反切之濫觴歟」，雖然也有一些學者與馬宗霍先生持相同之看法，例如：饒炯、江學謙先生等，⁴⁸但這種說法能否成立仍存有相當大的疑問，吾人所持之理由如后：
(一) 時代背景不符：在先秦之古漢字中，已有古漢語多聲符字構形文字之流通，而且，尤以春秋戰國爲最。然而，反切之法，依據文獻記載資料，最早至漢末才開始出現⁴⁹，因此，吾人以爲，多聲符字之構形法

則不可能根據反切之法而造字，至少在時代上就不符合實際狀況，即如史宗周先生在其所著之《中國文字論叢》一書中，在討論「二聲字」的成因時所言：

實際應用反切之理以切音，迨始於東漢末葉，而大行於魏晉。二聲字之肇造，雖不能判定究始於何時，而竊或聲義等二聲字，已普遍應用於戰國前之早期經典中，要非兩漢方制之字，則已甚明。如謂周秦人即用漢末方有之反切之理以制字，這不可能。⁵⁴

雖然在漢字發展史中，亦曾出現過以反切字作偏旁而造的漢字，即梁東漢先生在其所著《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一書中所謂之「拼音文字」⁵⁵與裘錫圭先生在其所著《文字學概要》一書中所謂之「合音字」，⁵⁶但這些文字構形出現之最早年代，也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之事，因此，尙無足夠之證據能夠證明古漢語多聲符字與「以反切之理」造字之「拼音文字」或「合音字」有任何直接或間接之關係。

(二) 音理不符：反切造字之法，上字但取其聲，下字但取其韻，上字與本字雙聲，下字與本字疊韻，如此一來，上字、下字與本字三構形之間並非同音之關係，但觀古漢字中之多聲符字，聲符與聲符、聲符與本字雙聲疊韻或雙聲韻近或疊韻聲近者，所在皆有。因此，將反切之法套用至多聲符字之構形理論中，於理不符，除非對反切之法另定新則。因此，將多聲符字之產生，認為是「反切之濫觴」的說法，存有相當大的質疑度，除非能在新出土之材料中找到更有力之證據，否則，此說斷無成立之理。

六、唐蘭先生所著《中國文字學》：「唐蘭先生對古漢語多聲符字的看法，大抵是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形聲字在造字時，只有一形一聲，（當然有些聲母本身已是形聲字，）絕對沒有同時用兩個形或兩個聲的」，並認為「形聲字只有一形一聲，凡所謂二形一聲、一形二聲的字，如其不是錯誤，就都是鍾益字或複體形聲字」。其實，唐蘭先生的這種看法，一直是古漢語多聲符字研究中的爭議問題，在上述之著錄資料中，清代的朱駿聲與近代的湯可敬先生等學者的看法皆與唐蘭先生近同，而這些學者們立論的根據與基礎，即中國文字單音節與多層鍾益造字之特質，然而，仍有一些問題或有待作更進一步之討論：

應劭時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96年（民國85年）9月改版，219頁。

⁵⁴ 詳見史宗周先生所著《中國文字論叢》一書，台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書局編審委員會發行，1978年（民國67年）8月印行，311頁。

⁵⁵ 詳見梁東漢先生所著之《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一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59年（民國48年）2月第1版，1965年6月第4次印刷，57頁。

⁵⁶ 詳見裘錫圭先生著《文字學概要》一書，131頁。

⁵⁷ 詳見唐蘭先生著《中國文字學》一書，107頁-108頁。

⁴⁸ 詳見東漢許慎著、清代段玉裁注《說文解字》，763頁。

⁴⁹ 詳見王國維先生所撰《觀堂書札（與羅振玉先生論學手札）》丙辰年（1916年）第二札、第七札，發表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10頁-45頁。

⁵⁰ 詳見林義光先生著《文源》卷十二「二重形聲」，1920年。

⁵¹ 詳見馬宗霍先生所著之《文字學發凡》一書，楊家駱先生主編，台北市：鼎文書局出版，1978年（民國67年）4月再版，95頁。

⁵² 詳見饒炯著《文字存真》，《說文解字詁林》六書總論；詳見江學謙先生所撰之《六書形聲研究》一文，發表於《東海學報》28卷，1987年（民國76年）6月，1-22頁。

⁵³ 據林尹先生所著《中國聲韻學通論》一書中，論「反切之原始」時，引論章太炎先生之語：「是

(一) 六書構形理論是以小篆構形系統為主，雖能適用於大部分之先秦古文字，但也非可完全適用，古漢語多聲符字構形特殊，能否以形聲字之構形理論加以「完全」套用，實有再斟酌的必要。

(二)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構形與一般形聲字一樣，與語言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其中之所謂音變、方音等要素，都有可能影響古漢語多聲符字之造字與用字，可能不只受到「一形一聲」之影響而已，因此，對此特殊構形之研究，不可只著重在構形方面，而忽略了聲韻或語言方面的證據。

(三) 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構形，除了形聲標音字外，還包括純雙聲符字。這些純雙聲符字之構形理論特殊，除了有人名或地名之專用字外，另有常用字再纏益標音符號之構形，而這些特殊之構形，並無法「完全」套用形聲字之構形理論，仍有許多待解的謎團。但在清代朱駿聲、唐蘭先生與湯可敬先生等前輩學者的理論中，卻甚少提到這類構形，如果他們也能夠把這方面之構形資料列入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範圍，相信他們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看法會有所改變。

七、史宗周先生所著《中國文字論叢》：⁵⁸史宗周先生的這本專著，雖然是屬於文字學方面之通論性著作，但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解釋與說明卻是相當地詳盡，比起同時期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專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在當時並未引起廣泛之共鳴。在文中，史宗周先生把古漢語多聲符字中之「形聲標音字」之構形定名為「二聲字」，與裘錫圭先生在其所著之《文字學概要》之定名相同，至於另一種「純雙聲符字」之構形，則定名為「增聲字」，但史宗周先生只承認「二聲字」之「雙聲符」構形，對於「增聲字」，則認為此構形只有一個聲符，因為原來未加聲符前的本字，已轉化為義符之緣故；史宗周先生的這種說法，和上述袁家驊先生對「純雙聲符字」構形的看法，尤其在聲符之認知上，仍有所差距，但史宗周先生已明確將累增字、增聲字、形聲字等三種構形分開，認為：

累增字、增聲字、與形聲字，三者均由義符與聲符組合而成，形極相似，每易互混，……實則累增、增聲與形聲，各具特徵，鑒然有別。

確立了增聲字有別於傳統六書形聲字構形之特殊地位，可惜史宗周先生只將研究範圍侷限於《說文解字》，並未引用更多之古文字資料，尤其未見「純雙聲符字」中地名或人名專用字一類之引用，否則，研究成果將會更豐碩，甚至重新確立其增聲字之理論基礎。另外，在增聲字或二聲字之起因方面，史宗周先生亦明確反駁饒炯與林語堂先生之

「本音方音」與「拼切為音」之說，⁵⁹認為增聲字與二聲字不過是先民為學習之方便，而在生疏字之旁加注一「同音之熟習字」所形成之構形；蓋史宗周先生之說法，雖極具參考之價值，但於證據上仍稍嫌不足，史宗周先生以增聲字或二聲字所增聲符與本字之音讀相同或相近之理，駁斥饒炯與林語堂先生之「本音方音」與「拼切為音」之說不可信，然而，史宗周先生並未引用更多的古方音資料，尤其，考證古代之語言，首重審密之特定時間與空間之配合研究，如果未能作好還原之工作，純粹只就中原音韻之理解說，則此論證結果將相當危險，甚至於史宗周先生在文中對古今音變之因素更是闡釋不多，更是加深了理論之危險度，其實，在先秦之古漢語多聲符字「純雙聲符字」一類中，便有極具地方色彩之人名或地名專用字，亦有上述袁家驊先生所謂常用字附加聲符之構形，這些特殊之構形不僅可能與古方音、古今音變等語言現象脫離不了關係，而且如果套用史宗周先生「為求學習方便而附加聲符」之說法，恐怕也將很難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故總而言之，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牽涉到相當多層面的因素，舉凡構形演變、古今音變、古方音、文化背景等，都是不可忽視的環節，唯有透過更精密的文字與聲韻之還原工作，始可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作更深入之界定。

八、江學謙先生所撰《六書形聲研究》：⁶⁰江學謙先生將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構形歸在形聲變例之中，將「形聲標音字」之構形定名為「複合形聲」，而將「純雙聲符字」之構形定名為「兩體皆聲」。但江學謙先生認為「二形二聲」構形之「複合形聲」字，「與形聲界說原理不合。……只其本始，多有可疑」，至於「兩體皆聲」之構形，江學謙先生也無法對其作更詳細之界定，僅提及整理小篆構形而成之六書理論，尚無法包容「全部文字制作之理」，「兩體皆聲」之構形理論即為其中之一，雖然江學謙先生未對此二種構形作更深入之界定，但已確立了這兩種構形與一般傳統「一形一聲」之形聲字構形有別之特殊地位。另外，江學謙先生在文末之結論中，探討語言與文字之關係時，列舉了「拼切成聲」的字例，但這種說法是否能夠成立，仍存有相當大的疑問，我們在探討馬宗霍先生與史宗周先生之理論時，已作過簡要之討論，茲不贅述。

九、裘錫圭先生所著《文字學概要》：⁶¹裘錫圭先生把漢字構形分為表意字、假借字與形聲字等三種，實際上是承繼唐蘭先生與陳夢家先生之所謂「三書說」，並立新論來概括傳統之六書理論，⁶²但對於古漢語多聲符字

⁵⁸ 詳見史宗周先生所著《中國文字論叢》一書，台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發行，1978年（民國67年）8月印行，283頁-314頁。

⁵⁹ 詳見饒炯著《文字存真》。

⁶⁰ 詳見江學謙先生所撰之《六書形聲研究》一文，發表於《東海學報》28卷，1987年（民國76年）6月，1-22頁。

⁶¹ 詳見裘錫圭先生著《文字學概要》一書，131頁-132頁，177頁-178頁。

⁶² 唐蘭先生之所謂「三書說」，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與形聲文字，詳見唐蘭先生著《中國文字學》，75頁-79頁；裘錫圭先生之「三書」理論則再據陳夢家先生之說而修改，詳見裘錫圭先生

這種特殊構形，除了將其所謂「二聲字」或「多聲」字之「形聲標音」構形歸入形聲字構形理論之中以外，至於另一種其所謂「兩聲字」之「純雙聲符字」構形，裘錫圭先生則是指其為「不能納入三書之文字」，裘錫圭先生的說法，可作為我們探討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六書構形理論關係時之思考方向與參考資料。雖然裘錫圭先生在書中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論述不多，但在他的構形理論中，仍是承認了這種構形之存在性。

十、高明先生所著《中國古文字學通論》：⁶³高明先生與唐蘭先生一樣，對其所謂「複形複聲」之古漢語多聲符字構形皆持否定的看法，所持的理由亦是前所述中國文字單音節與多層纏益造字之特質，但這種說法，仍有其令人懷疑之處，本文在前文論述唐蘭先生之論點時已有討論，茲不贅述。

十一、許師錢輝所撰《形聲釋例（中）》：“許師這篇專著，詳細探討了形聲字構形的各種類型，而在文中討論「聲文繁縷例」時，所提出聲文繁縷之理由，即「求應方俗異音」與「求應古今變音」等兩點，道出了形聲構字與語言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雖然許師尚未將「純雙聲符字」構形列入討論範圍，但仍可作為我們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起因時之思考方向與參考資料。

十二、黃德寬先生所著《古漢字形聲結構論考》：“此為黃德寬先生之博士學位論文，在其論著中，曾提到「有少數借字加注聲符而形成的形聲字」：「兩體皆聲」、「兩聲字」與「二重形聲」等構形，並將其歸為「形聲結構的一個附類」或「特殊的一類」，若依黃德寬先生所言，則其所言之此形構類型，當為前所述之「兩聲字」或「純雙聲符字」，值得注意的是，黃德寬先生重新詮釋了此類構形之結構：

其實，這種“兩種皆聲”的先有之“聲”，已習慣上記載著原字義；後加之“聲”，功能才在記音。前者既已消失了記音功能，也就成為凝結借義的變相“形符”了。⁶⁴

此項看法，有助於釐清多聲符字形構部件之功能或性質，但仍需注意文字部件之歷時性條件，因文字之組成若僅見於共時性之資料，在無歷時性構形可資比較之情況下，多聲符字所從聲符之先後附加順序，不僅會產生判讀上之困難，亦會影響研究與分析之結果，因此，文字部件組成之歷時性與共時性分析，對研究多聲符字形構部件之功能或性質是相當重要的。

裘錫圭先生著《文字學概要》。

⁶³ 詳見高明先生著《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一書，75頁-77頁。

⁶⁴ 詳見許師錢輝所撰之《形聲釋例（中）》一文，發表於《國文學報》第十期，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發行，1981年（民國70年）6月30日出版，129頁-167頁。

⁶⁵ 詳見黃德寬先生所著《古漢字形聲結構論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6年。

⁶⁶ 詳見黃德寬先生所著《古漢字形聲結構論考》，61頁-62頁。

十三、何琳儀先生所著《戰國文字通論》：⁶⁷何琳儀先生將古漢語多聲符字分為兩類：即「形聲標音」與「雙重標音」，但何琳儀先生也只提出相關之例字，仍未對此二種特殊構形作更進一步深入之解釋，不過，何琳儀先生所提出「可能與當時書寫者崇尚繁縷的心理」之起因假設說法，亦可作為我們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起因時之另一思考方向與參考資料。

十四、梁東漢先生所著《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⁶⁸梁東漢先生在文中也是明確地否認「多聲」字的存在性，其所持的理由與前文所述之唐蘭先生、高明先生的論點相同，對這種說法之質疑理由，本文在探討唐蘭先生論點時已有所論述，在這裡所要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梁東漢先生所認為「在同一個字裡有兩個音符同時各自代表不同的讀音，這是不可能的」的論點，吾人之所以要對這個論點提出質疑，乃因為如果從文字之使用情況而言，文字聲符構件已失去精確表音作用的話，用字者有可能再附加一聲符以表音，在此情況下，「未附加聲符之本字」與「附加聲符後之後起字」，又在同時間之古文字資料或器物群中出現有相同用法或互相通用、通假，甚至有異「未附加聲符本字」得聲之字存在的情況；則所謂之「兩個音符同時各自代表不同讀音」的可能性將大增，尤其如果又出現在深具地方色彩之古文字資料中，則「兩個音符同時各自代表不同讀音」之論點將更具可信度，因此更可推知，如果在古今音變與方音差異等背景因素之影響下，出現「兩個音符同時各自代表不同讀音」構形之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十五、詹鄞鑫先生所著《漢字說略》：⁶⁹詹鄞鑫先生將古漢語多聲符字中之「純雙聲符字」構形認定為「表音性文字附加表音符號構成的形聲字」，雖然詹鄞鑫先生不否認這種特殊構形「兩個符號都是表音」與「不能歸入形聲字中」之可能性，但詹鄞鑫先生從「古人之造字意圖」之觀點來探討這類構形，以為「本無其字依聲托事的假借字既然已具有表示界義的功能，就不應該把它所具有的形符資格取消掉……看作形聲字是完全合理的」，蓋詹鄞鑫先生的說法，確認了「純雙聲符字」兩個構形皆表音之特質，但能否將此類構形看作是形聲字中的一類，恐怕還有再作斟酌的必要；至於另一類之「形聲標音」字，詹鄞鑫先生將之視為「形聲字附加表音符號構成新形聲字」，且認為：

這類字往往被誤認為兩個聲符，實際上應把除掉附加表音符號後所剩的形聲字當作一個整體符號來看待

亦即詹鄞鑫先生與唐蘭先生或高明先生等學者的看法相同，並不承認

⁶⁷ 詳見何琳儀先生著《戰國文字通論》一書，202頁-203頁。

⁶⁸ 詳見梁東漢先生著《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一書，125頁-126頁。

⁶⁹ 詳見詹鄞鑫先生著《漢字說略》一書，195頁-197頁。

貳、未來之研究方向

綜觀以上各文字學者之理論與說法，可知古漢語多聲符字這種特殊構形，不僅已經開始引起注意，而近來之研究成果，亦有漸漸打破傳統許慎《說文解字》說法之趨勢。但不可諱言，仍存在許多爭議性之問題猶待解決，例如：

一、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存在性問題：在一些學者之研究著述中，他們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存在性是持否定的態度，認為這種特殊構形不過是形聲構形之一類而已，例如唐蘭先生、高明先生等；但也有一些學者承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存在性，例如：袁家麟先生、陳偉武先生等。這個問題爭論已久，仍未有確切之答案，希望藉本文之探討，能夠對此問題稍作釐清與解釋，並嘗試瞭解先秦特殊漢字構形之謎。

二、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範圍與分類問題：袁家麟先生將純雙聲符字兩大類：即人名或地名之專用字與常用字再附加聲符之純雙聲符字，但此分類方式是否合宜，都需再作更詳細且深入之界定，更何況大多數學者在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時，往往對「純雙聲符字」類型著墨甚少或略而不論，這些都是未來我們研究工作需加強的重點；至於形聲標音字之分類，由於學者間認定上的歧異，猶未作詳細之界定與分類，這些研究主題都有待突破。

三、古漢語多聲符字與語言的關係：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形聲字一樣，和語言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古漢語多聲符字所涉及到的語言內容，比形聲字更複雜，我們在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時，所要釐清的觀念與問題，不僅包含了先秦中原古音系之內容，同時也要注意古漢語多聲符字與當時古方音之關係，但有關於這方面之研究，前輩學者們並未多作闡述，如此一來，也影響到了古漢語多聲符字界定時聲韻語言證據之不足，因此，這些主題都可當作我們未來可再加強的研究方向。

五、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六書構形理論之關係：從前輩學者們之研究中，可知古漢語多聲符字之構形理論與傳統之六書構形理論關係密切，尤其與形聲、轉注與假借等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歷來之前輩學者對此關係之界定，仍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尤其對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形聲字關係之界定，更是意見紛歧，此為有待釐清問題之一也；另外，例如古漢語多聲符字與文字孳乳、文字分化、文字聲化、分別文、累增字、象形標音、指事標音、會意標音、形聲標音等文字發展現象之關係，亦為有待釐清之問題也。

六、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問題：有關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問題，牽涉範圍甚廣，除了受到如袁家麟先生所謂「簡化」與「標準化」等文字發展本身限制因素之影響外，外在之語言環境、歷史背景、政治發展與教育文化等因素，也都很有可能影響到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發展，但在歷來學者之研究著述中，大多僅著重

「形聲標音」兩個聲符的存在性，儘管如此，綜合詹鄞鑫先生對古漢語多聲符字的看法，他仍然是承認漢字構形中的確有「由兩個聲符構成之字」存在的。

十六、劉釗先生所著《古文字構形研究》：⁷⁰劉釗先生以西周金文為例，探討西周金文中的「音化」現象，其中，他將「純雙聲符字」之構形，定名為「雙聲字」，並認為：

雙聲字是指一個形體的兩個構形因素對於所記錄的詞來說都是表音的聲符，而沒有形符、意符或其它別的成份。這類字一般都是在只表讀音的假借字上累加聲符而成。

蓋劉釗先生對「雙聲字」構形之解釋，與前所述詹鄞鑫先生之說法近同，只不過劉釗先生並未對「雙聲字」之構形歸屬問題作更進一步之探討而已；至於「形聲標音」之構形，劉釗先生稱其為「迭加聲符」之現象，並提出三項起因：即音變、辨義作用與強調讀音而作疊床架屋式的繁化現象，這些都可作為我們未來研究方向之參考，尤其，「辨義作用」一項，更涉及到「轉注之法」之範疇，有助於釐清古漢語多聲符字與六書傳統構形理論之關係。

十七、單周堯先生〈多體形聲字窺管〉：⁷¹單周堯先生此篇專文探討之重點雖集中在多形之形構，但對於許慎《說文》所列舉「竊」與「𠂔」二字則改釋為多形一聲與一形一聲之結構，基本上否認其存在多重聲符之可能性，惟單周堯先生在作結論時，對以多體形聲結構之理論去釋讀一些複雜之形聲結構，大抵是持較肯定之看法的。

總結以上學者們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研究理論，大抵可歸納出幾個主要的研究趨勢或成果：

- 一、許慎《說文》所指「竊」與「𠂔」多聲二例，透過歷來學者之考證與出土古文字資料之佐證，已初步排除此二字為多重聲符結構之可能性。惟鄭樵《六書略》所提「子母同聲」之說，其相關論點或字例，反而可能成為後世文字學者研究多聲符字之論證與依據。
- 二、多聲符形構之爭議多在文字歷史造字層次之認知上，否認有多聲符結構存在之學者，皆以為多聲符結構乃形聲結構繁縷成為複體結構之結果。然若多聲符結構尚無歷時性之形構可資比較，則其造字層次之分析將有一定程度之困難。
- 三、近來學者們對於多聲符形構之分類大抵有二，即雙重標音與形聲標音，其中，雙重標音結構疑由鄭樵《六書略》發其端，而為《說文》所

⁷⁰ 詳見劉釗先生所著之《古文字構形研究》，長春市：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130頁-136頁，142頁-143頁。

⁷¹ 詳見單周堯先生撰〈多體形聲字窺管〉，《中國語文研究》第十期，37頁-58頁。

在文字本身構形方面之研究，對於文字外在之語言文化之研究則多屬佐證性質，並未特別強調其重要性，因此，吾人主張若要研究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必須對文字構形本身與外在條件並重，始可對古漢語多聲符字之起因問題作更深入之界定。

第二章 戰國楚系形聲結構初探

如前所述，所謂古漢語多聲符字，即表示具兩個或兩個以上具表音功能部件之形構組合，而在漢字系統中，惟有形聲、轉注與假借等結構具有表音性質或功能，但轉注與假借又多藉形聲結構以呈現，故若欲探究戰國楚系多聲符之結構，猶應從形聲結構著手，以嘗試瞭解多聲符結構之造字或用字之理。

但研究先秦古文字系統之形聲結構，實有相當程度之研究困難，除了並無類似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之相關傳世釋形資料外，文字結構、筆劃與偏旁之不固定、上古音系與方音之複雜、同源、諧聲與音義系統之發展等因素，皆會影響形聲結構之釋讀，茲暫將戰國楚系之形聲結構分為縱向之歷史造字層次與平面組合方式兩類，冀能對戰國楚系形聲結構有更進一步之認識。

第一節 歷史造字層次之形聲結構分析

此項分類即以戰國時期為時間之基準點，通過歷時性之形構比較分析，藉以釐清戰國楚系形聲結構之造字層次。除了探討結構本身部件之繁化或簡化外，更將部分訛化或異化之形構列入，茲分為「單一歷史造字層次」、「多重歷史造字層次」與「同取型歷史造字層次」三類：⁷²

壹、單一歷史造字層次之形聲結構：此類字例為形聲歷時性造字結構最基本之形式。透過歷時性形構之比較，此類字例疑在早期之形構基礎上，產生了至少一種之形構變化，或成為後起的新形聲字、或成為改造的新形聲字。茲依其構形變化之情況，將此類形構分為「疊加形符」、「疊加聲符」、「形符替換」、「疊加形符」、「疊加聲符」、「形符替換」、「聲符替換」、「形符脫落」、「聲符省減部分形構」、「形符省減部分形構」、「聲符訛化」、「承續早期形構例」等類，略述如后：

一、疊加形符例：此類形構屢見於戰國楚系文字之中，藉由疊加形符之方式，產生了許多後起形聲字構形，林素清先生即以爲：

戰國時代，由於文字使用遽增，字形變化極大，這種增添意符的方式，被運用得相當廣泛，而便於表義的形旁系統化，也是文字再添形符的重要因素。⁷³

⁷² 受限於筆者能力與造字時間等因素之影響，本章節所舉字例之隸定字形多以通讀字代替，並未全部皆依原字形隸定。

⁷³ 詳見林素清先生撰〈論戰國文字的增繁現象〉，《中國文字》新十三期，中國文字社出版，1990年（民國79年）2月初版，28頁。